

文化之统一与宗教之普及^{*}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协和主日会的一次讲演

曹云祥

几个星期以前,我有幸聆听 Dr. Luce 的演讲,题为“解读时代之征象”。这位怀有乌托邦梦想的演讲者自问,何为世界新千年的征象。依我之见,这些征象至少应首先导向“文化之统一与宗教之普及”。文化而不统一,则枉称文化,终不免流于浅薄;宗教而未普及,则愧为宗教,总不过是迷信或教条而已。

在以文化之统一为目标的运动中,最突出者莫过于在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大会。

会议之议题是通过教育根除无知与不公,而无知与不公恰是导致各国之间仇恨与误解的根源。此呼吁传达至七十三个国家的一千名联络人,其中包含的目标如下:促进世界各国的友谊、公正和亲善;提倡全世界包容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其种族或信仰;欣赏各民族在数百年的发展与进步中传承的遗产之价值;确保不同国家之学校教科书中的信息准确而充分;使全民族同心同德;在新一代人的头脑与心灵中培植灵性价值,使他们能够把华盛顿会议上所强调的诸多原则发扬光大;最后,强调最重要的是人类的团结,指出战争的本质乃自杀,而和平乃人类所必需。

对此运动有兴趣者,共有一万八千人参加了开幕会议。一位目击者称:“身处这会场之中,看着来自全世界的面孔,他们是来自世界各民族的代表而不是少数领先国家的代表,他们汇聚一堂,热诚讨论,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怀揣伟大的人道动机,这一切令人心潮澎湃。人在此处总会感到,那至大至纯的真理,那将使人类更善良、更宽容、更忠诚、更道德、更虔敬的强大力量,将由此扩散开去。”

^{*} 本文的英文原题为“The Unity of Civilization”,它曾经在《巴哈伊年鉴》(*Bahá'í World* 1925~1926)第 141~147 页刊发,潘紫径女士翻译,收入蔡德贵著《清华之父曹云祥》一书。这篇讲稿原是曹云祥 1925 年 1 月 25 日在北京协和医学主日会上的英文讲演,所讲内容包括了巴哈伊教的 12 条教义,可见此时曹云祥已经洞彻巴哈伊教的基本思想。其中引用的 12 条教义就包括:

1. 独立探寻真理,消除各种歧视与偏见。
2. 人类一家,所有人乃“一树之叶,一园之花”。
3. 宗教必须带来爱与团结,否则不如没有宗教。
4. 宗教同源。
5. 宗教与科学必须齐头并进,信仰与理性必须一致。
6. 世界和平。
7. 男女平等,拥有同等发展机会。
8. 消除极端贫富差距,并为之努力。“以服务的心态工作等同于崇拜。”
9. 建立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联盟、国际仲裁机构利国会。
10. 采纳一种语言作为国际辅助语言,并在全球各个学校教导。
11. 普及义务教育——尤其是针对女性,她们将为人之母,并是下一代第一任教育者。
12. 认知上帝,并遵循其通过各个显圣者所启示的教导。

但凡认为人类团结曾有所改善或世界终将摆脱武力争斗的,总不免遭到很多人的嘲笑。但是,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水静而流深的信仰,它相信促进世界团结之诸力量有着非同寻常的品质,其影响范围远非制造争端之诸力量可比。争端是爆炸性的,但也是暂时的;和谐是缓慢上升的,但终将成为主旋律。

世界大战显然已使人们认识到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威尔逊总统对国联的理想未能全然实现,随之发生的事件必然会使思想家们重新回顾某些著作,如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费勒(Fayle)的《大殖民》(*The Great Settlement*)以及凯因斯对《凡尔赛和约》的勇敢批判,最近甚至康德(Kant)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也推出了新版。

最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广义教育》(*The Wider Aspects of Education*),其中收录了古奇博士(Dr. G. P. Gooch)的数篇论文,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立场,指出各国家的不受限制的主权是“现代世界的诅咒”。他说:“一千年来,从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文化之统一的理念一直统治着欧洲。他们把欧洲称为基督教共和体(Res Publica Christiana),并信奉文明人类之团结这一伟大理念。只是从约四百年前开始,伟大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才提出国家主权的概念,赋予每个国家以至高无上的主权,只对自身负责,而不对其他国家负有任何义务,亦对人类社团不负有任何义务,并仅需向一个神圣统治者或内在神性指引致以礼仪性的敬意。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为英格兰的霍布斯(Hobbes)和德意志的黑格尔(Hegel)所继承,并成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政论家所信奉的既定原则。因此在过去四个世纪里,人类之灵魂便在世界公民的教义和纯粹世俗的民族政治之新教义间不断挣扎。”

古奇博士把世界大战视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头脑狭隘和思想偏执的民族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的最终反证;他相信当今最好的思想和最好的思维,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就是转向世界公民的理念,并使其完成从神学基础向伦理基础的转变,并不断壮大,直至拥抱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度。这一进程不仅因世界大战所暴露的主权教义之破产而前进,还因我们亲自经历的这种挣扎之结果而发展。

他相信,要想让这一理念深入到政治家或流浪汉、校长或历史学家的意识或潜意识中,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它必将实现。他确定不疑地指出,倘若我们这些与教育或教育行业相关的人,不尽我们之所能去率先接受文化之统一的基本事实和人类文明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相互义务,并进而向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向每一个向我们求教的人,传达这一伟大的启示性的理念,那就是我们的重大失职。

最近,我被一段文字深深震撼了,这篇文字出现在一本旨在培训军事领袖的书上。文中说:“在旧有的观念下,爱国的含义是尽一己之全力为本国争取权力、荣誉和光耀,甚至在必要时必须牺牲其他国家。但是从更高层次上讲,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通过诚实的努力,通过良好的治理,通过无私而不是征服,通过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的友谊,通过使本国的名号与旗帜受到所有民族的尊敬,来为本国赢得权力、荣誉和光耀——所有这些都为了一个目的,即为了造福全人类。这种观念不是贬损爱国主义,而是使其更加高贵。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以营私于世界为荣。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对他人或他国负有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人类文明获得提升,并使文明世界的生活获得永恒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或称民族主义。”

两年前,在一个年会上,笔者有机会与国内领袖级教育家交谈,结论是改良的儒学,即所谓的“新

《大学》论”。孔子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根据现代知识，我主张用科学来格其物、致其知，用宗教、伦理和生命哲学来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用社会科学来齐其家、治其国，用文化之统一和宗教之普及的理念来明明德于天下。

国家主权的观念使狭隘的民族主义限制了文明的范围，而大多数伟大的宗教却提倡大同。但是，宗教却未曾做到言行之一致。

在纽约一个近二百人参加的圣经课上，小洛克菲勒说，在现代的仓促进步中，现代智识的发展远胜于宗教的发展。他引用大英帝国的财政大臣温斯顿·邱吉尔最近的一篇文章说：“一九二四年之理念是在和平的表象之下远征，并在世界各军队之中完善。人类已掌握了必将毁灭自身的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小洛克菲勒先生这样问了，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因为人的灵性品格未能与人的智识同步发展。文明，即才智和物质的累积，暂时胜过了宗教。宗教必须加快步伐，否则人将无法及时觉悟，将自己从战争的恶梦中拯救出来。”

小洛克菲勒先生说，宗教的启示适用于人类事务，比如说医院、住宅计划，童工法、工厂法等。他宣称：“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在这些启示的背后，有一种基督精神。人的悲悯心是我们灵性理想主义之花。如果人类要在紧密交织的现代社会中共同生活下去，就必须接受源自上帝之爱的原则之指引，从而热爱我们的兄弟。尽管文明可能暂时胜过宗教，但其生长力却未见更强大。”

让每个人都这样问自己吧。“智识或文明，现代生活需求和神经质激情，是不是已胜过了我那恒久的宗教信仰？”更具体地说，“如果你信仰上帝之爱是天父之爱，你能不能爱人类如同自己的兄弟？”为什么我们的耳中不能时时回响这样的经文：“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难道我们没有听说过那个伟大的灵魂，当他的狗碰倒了图书馆里的蜡烛，烧掉了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手稿时，他的不快仅限于这样呼叫：“钻石啊钻石！你不知道你闯下了多大的乱子！”如果我们不能把这宽恕和同情的精神贯穿于我们的存在之中，那么宗教只不过是一件星期日的礼服。

从世界大战以来，德意志思想家们就忙于创立新哲学，尽管德意志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饱受饥饿和社会动荡的折磨。肉体的穷乏似乎使他们的精神需求变得比对食物的渴望更加迫切。哲学著作成为千百万中产阶级的追求。例如，张伯伦的《十九世纪文明的基础》一书卖了十五万册，韦亨格的《仿佛哲学》卖了五万册，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的衰落》（即《西方的没落》）卖了七万册，而凯泽林的《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则卖了五万册。

凯泽林伯爵出生于德意志贵族家庭，祖籍俄罗斯波罗的海外省，在革命中被剥夺全部财产。他那一代人所面临的社会和道德混乱，使他陷入绝望之中，作为一个教义与哲学的学习者，他因此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他尽量像佛教徒那样去感受和思考，在印度像婆罗门一样去感受和思考，在中国像一个儒士一样去感受和思考，在日本像日本人一样去感受和思考，在美利坚合众国像一个美国人那样去思考。”他的精神转变被记录下来，即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他的结论可概括如下：“所有的事实，所有的教义，都是同一灵性意义的不同表达；它们是我们能够对灵性事实的真实世界获得认知的惟一途径；对其意义的更深层理解将使人更有力量、更完美；除了我们此种理解的提升以外，别无人类进步。”

对于灵性生命来自同一个源头的哲学认识刚出现没多久，但是早在 1905 年，协和神学院的院长

查理·库斯伯·霍尔博士(Dr. Charles Cuthbert Hall)就观察到,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非神职人员,都对旧式的教派纷争越来越深恶痛绝。他声称,文化圈对于教会的合法职能产生了更真切、更明智的判断。萌芽状态的团结观念和生命与爱的运动无所不在,就像雄鹰展翅般不可阻挡,但却在无意间忽略了潜藏的分裂因素。同时,宗教哲学的进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相关发现,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新的世界大同理想,以及上述所有圣经批判的建设性成果,都在把诸多智识卓越和灵性圣洁之士凝聚在基督信仰和实践之下,既不混同于激进的异教主义,又独立于教派分裂。这种感情的基调不是革命性的,而是进化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这种自发的情感清晰地表现在从非教派的角度对教会进行重新阐释,而这必须通过那永恒真理的凝聚力量,使所有人获得提升和吸引,并通过那永恒之灵的生命之力赋予每个人以自由。

霍尔博士预言异教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人为阻碍将逐渐坍塌,宗教生活将在更广阔的领域更自由地发展;继而霍尔博士讲述了他对东方的人民寄予的希望。“当一个人站在令人景仰的东方的心脏,感受那宗教脉搏的律动,审视那些容颜所显露的灵魂未得满足的征象,思考那些宏大而持久的建筑形式所表达的宗教情怀,就很难想象有谁会说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有谁能否认这一切都是那些未能获得完满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的内在神性的见证,有谁又能断言这一切都将被铲除和灭绝,而基督教终将在其废墟上崛起。我对于非基督教的信仰充满了热忱的希望和渴求,相信这些信仰都闪烁着神的破碎的光芒。”他还说:“基督教的普世信仰的精华在东方有着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的主是一个东方人,在我们的想象中他只能穿着东方的衣服,有着东方的举止,除非我们存心扭曲真理。若不是那陌生而不可理喻的西方总是试图把基督教强加给东方,通过不受欢迎的举止、习俗、性情、教条和军事政府,基督教本该早已传遍东方。”

“最后,当东方可以成为西方的补充和圆满,当东方可以向西方贡献自己看到的真理,并通过自身的体验去思考这真理的时候,世界对基督教的皈依才是对泽被全世界的基督信仰的更完整、更全面的诠释。”

我之所以长篇引用这些论述,是为了说明即便二十年前宗教思想家们在宗教生活中已在追求文化之统一和普世意义。近来,宗教观点更趋开明,比如在纽约出现了福斯迪博士(Dr. Fosdick)的教义,在伦敦则出现了英格的布道。

霍尔博士的预言在近年来很多知名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而这些运动或多或少都带有宗教色彩,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则皈依了巴哈欧拉(“神的荣耀”)和阿布杜·巴哈(“神的仆人”)所引导的巴哈伊运动。

“巴哈伊启示并非一个组织。巴哈伊圣道从未局限于一个组织之内。巴哈伊启示是当今时代的精神。它是二十世纪所有最高理想的实质所在。巴哈伊圣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运动,在巴哈伊运动中所有宗教和社会的教义都有所呈现。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见神论、共济会、唯心论等各宗各派的信徒,都可在巴哈伊圣道中找到他们的最高目的。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们也发现他们的理论已在巴哈伊启示中完满呈现。”

巴哈伊启示于一八四四年,兴起于波斯,今天已为全世界所知。“与其说它是新宗教,不如说宗教在更新和统一。”

这一以社会和精神重建为目的的独特运动,最初起源于一位叫巴布的荣光四射的青年,他的使命是宣称一位伟大的世界使者的到来。很多欧洲历史学家都描述过这位心灵圣洁的开明宗教英雄

的神奇魅力，他于一八五〇年殉道，即他传播其卓越教义六年后。

巴哈欧拉是一位波斯贵族，他即是巴孛预言中的使者。巴哈欧拉宣布一个新纪元的曙光已升起，在这新纪元里友爱与和平将如百川归海般遍布全球。然而，他所倡导的原则对于他同时代人的思想偏狭者来说，是超前的普世理想。他和他的几位追随者被波斯的反动势力放逐和囚禁，最终于一八六八年被关进叙利亚荒僻的阿卡兵营。

但是，当上帝圣灵的光辉在其先知心中闪耀的时候，世人的迫害是无法将它熄灭的。从阿卡那“至大圣狱”中，巴哈欧拉将他关于团结和爱的福音传播到了整个西亚。一八九二年，经过四十年的放逐和囚禁之后，他终于离世，留下他的长子阿布杜·巴哈为“圣约的中心”，为指定的圣言诠释者和圣道的传扬者。

在阿布杜·巴哈的引领下，巴哈伊理念被传至所有的国度和所有的宗教。它把基督徒和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都“团结在世人所知的最为灵性的兄弟同盟之下”。

巴哈伊相信，这是地球上的黄金时代的开始，所谓黄金时代即实现普世和平和友爱的时代，即基督所预言的，人“将从东方来，从西方来，从南方来，从北方来，并将同坐在上帝的王国里”。

“巴哈伊信仰把世界的所有宗教都团结在一个普世的宗教之下。它证实，所有那些宗教的初始教义的本质，是同一的，尽管在这些宗教的成长过程中，因为增加了教条、神学和仪式的形式，并掺杂了宗教领袖的野心，故而开始走向分裂。”

我列举了诸多证据，旨在证明文化之统一和宗教之普及已经存在。这些综合观念是令人心满意足的，尽管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完全实现仍需要漫长的时间。

这世界有多少破坏和痛苦是在文明与宗教的名义下施与人类的，林林总总，自相矛盾。如果没有秩序和体系，没有可理解性和一致性，没有团结，即使最好的文明和最好的宗教也只能带给我们不完整和不充分的真理，只是神圣使命的破碎的微光。这些概念无法使那质疑的灵魂满足，也无法呈现生命整体的宁静景象。只有实现文化之统一和宗教之普及，终极之钟才能敲响。



曹云祥先生身着外交官服小照